

培训机构却发展迅猛，于是不免“学生减负，越减越重”。

今年8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正式通过，为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场巨大变革。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这一次，减负能成功吗？

教育减负的前世今生

在人们惯常的印象里，减负是一个伴随着素质教育而兴的概念，其历史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减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彼时，中国教育的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和西方近现代的科学知识外，又增添了很多特色课程。因为要求“人人有学上”，于是学业负担也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对于学业负担问题，毛泽东曾先后于1950年和1951年两次致电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重要指示。

1955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此后，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就有近10道。

1988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决定》后，各地掀起为小学生减轻课业负担的小高潮，但不甚理想。

随后，国务院在1993年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同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1994年，又发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2000年国务院和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出了7条举措，因此被称为“减负7条”；2013年8月，教育部又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俗称“减负10条”），

公开征求意见；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对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等方面提出30条措施……

这些“减负令”的内容，大多涉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要求不得随意增减课程和教学时数，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要严格控制考试和竞赛次数，以及制定每日作业量，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而在吕志亮小升初那年，国家也是真的在减负。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实发布过《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件，明确“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件的内容来看，减负力度似乎是在层层加码。

为什么知易行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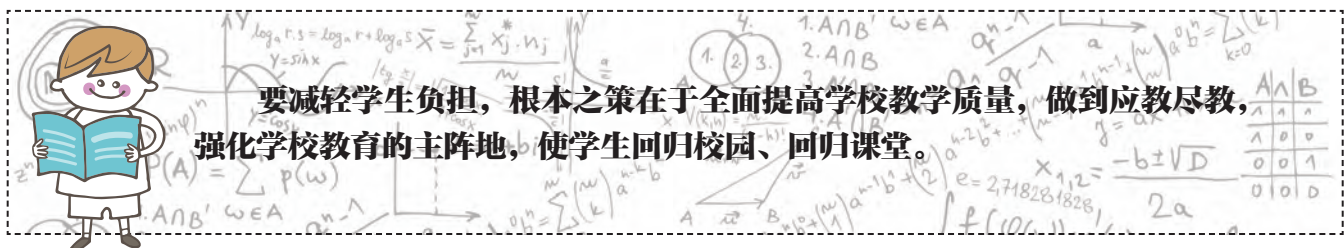
但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减负远没有说得那么简单。

如今已是9岁孩子父亲的吕志亮就坦言：“家庭作业是没有了，但孩子一年级时，老师每天都在微信群里布置作业，包括给课堂练习改错、做手抄报，甚至给家长留作业，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做‘互动练习’。”

此外，吕志亮还说，孩子的语数外每单元都会考试，老师会让得满分的学生拿着奖状上讲台拍照，然后发到家长微信群，“每逢大考，老师提前两周就每天给家长布置作业让家长带着孩子复习”。

从中央到地方，减负三令五申。在前教育部长陈宝生看来，减负所要减掉的就是超出教学大纲的违反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学业负担。

但对于家长们而言，更多人却像吕志亮一样不堪重负，长期处在焦虑中。这些焦虑不只是“三点半放学”带来的接孩子难题。更为重要的是，校内减负后，如何面对应试教育下激烈的择校竞争，如何面对中高考的难题。



要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使学生回归校园、回归课堂。